

目 录

名家专稿

- 王应麟跋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辞》书后 史树青 (1) ✓
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
——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的意义 陈 炎 (3)

史前文化研究

- 舜帝、姚墟、河姆渡遗址相关问题的认识 邵九华 (17)
中华的蓝色文化
——一个久已失踪的“青国” 杨成鉴 (17)

古籍与文献

- 卢址和抱经楼藏书 骆兆平 (31)
樵斋赠书闻见记 骆兆平 (38)
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虞浩旭 (41)
碧沚藏书初考 袁 慧 (46)

考古新发现

- 浙江奉化晋墓清理简报 傅红军 (50)
浙东象山南田岛首次出土窖藏古钱 贺俊彦 (56)

文化家族研究

- 明代余姚竹桥黄氏世家述评 蓝溪子 (60)
黄宗羲与姚江书院 叶树望 (67)

对外文化交流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品介绍前言	周庆南译 (80)
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门户	
——浙东宁海三门湾的古代文化通道	杨古城 曹厚德 (95)

文物管理

加强业余文保员队伍建设、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体制的新模式	宁波市文化局 (105)
关于利用文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若干问题思考	翁平娜 (112)

宁波帮研究

宁波商文化轨迹初探	陈梅龙 (117)
虞洽卿与中国现代宁波帮	黄浙苏 (131)

古建筑研究

甬上范宅修复记	洪可尧 (137)
论“天叙堂”	许孟光 (138)

文物与文物保护

象山花岙岛何以成为张苍水最后抗清据点	夏乃平 吴国华 (145)
略谈中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	
——兼谈天一阁的藏书保护	张波 (148)
宋相王次翁墓院	应长裕 (154)
试从宁波出土的瓷器残片谈明代民窑青花瓷演化的认识	陈明良 贾丽玉 (157)
谈继承我国书画装裱优良传统的重要性及其他	王金玉 (163)
古籍的纸张刍议	邱丹凤 (168)

它山之石

韩国保护文物的抉择, 奥地利的文物输出管理, 印度德里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丹麦博物馆法的特点	(172)

学术动态 (182) 出版消息 (130 167) 文博简讯 (183) 封二、封三说明 (184)
--

责任校对: 褚晓波

王应麟跋文天祥 书谢昌元《座右辞》书后

□史 树 青□

1989年9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13、14期发表了我写的《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跋》，谈到《座右辞》卷后的各家题跋中，首为南宋王应麟书赞。最近接连收到几位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图版里只见到《座右辞》本文，而未见卷后题跋，尤其像王应麟这样的重要人物，其手迹从未见过，如果这件题跋是真迹，那就是一件仅存的流传下来的王应麟手迹了，希望发表出来。我读到同志们的来信，觉得王应麟的手迹未能和读者见面，确是一件憾事，现在把它发表出来，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今宁波市)人。博学多识，在宋代罕有伦比。《宋史》本传说应麟淳祐元年(1241年)举进士，宝祐四年二月试博学宏词科中选。宝祐四年五月，理宗御集英殿策士，应麟充覆考检点试卷官。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应麟读之乃顿首曰：“是卷古谊如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帝喜，遂以第七卷为首先，及唱名，乃文天祥也。王应麟累擢秘书郎，应诏极论时事。度宗即位，累迁礼部尚书。上疏不报，遂东归。后二十年卒。

应麟著述宏富，有《深宁集》100卷、《玉堂类稿》23卷、《掖垣类稿》22卷、《诗考》5卷、《诗地理考》5卷、《汉艺文志考证》10卷、《通鉴地理考》100卷、《通鉴地理通释》16卷、《通鉴答问》4卷、《困学纪闻》20卷、《蒙训》70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救篇》6卷、《补

注王会篇》、《小学紺珠》10卷、《玉海》200卷、《词学指南》4卷、《词学题苑》40卷、《笔海》40卷、《姓氏急就篇》6卷、《汉制考》4卷、《六经天文编》6卷及《小学讽咏》4卷，并行于世。

在王应麟著作中，以《困学纪闻》、《玉海》为最著。《困学纪闻》是札记、考证之书，清阎若璩、全祖望、程瑶田、何焯、钱大昕、屠继绪、万希槐皆为之笺注，谓之“七笺本”，后又有翁元圻注本，最善。此书号为宋人考订书之最精核者。

至于王氏所撰《玉海》200卷，附《词学指南》4卷，体例近于《文献通考》，搜罗典故，囊括旧闻，凡天文、地理以及台阁、宫室、服食、器用等皆分门排纂，共240余类，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称宋代四大类书。

从《宋史·王应麟传》可以看到文天祥为应麟宝祐四年所得士，二人有师生之谊。今所见应麟《四明文献集》、《深宁先生文钞》所载有关文天祥事甚多。天祥于咸淳九年（1273）为谢昌元书《座右辞》，年仅38岁。时昌元60岁、应麟51岁。跋文虽未书年月，但文中所称：“昔唐子西，著论正友，敬斋（谢昌元字）述之，矫薄归厚。文山健笔，立懦廉顽，扶植名教，戾夫汗颜。我与二公，皆同朝旧，人亡书存，悲怀死疚。浚仪王应麟题。”浚仪，今开封，当是应麟祖籍。从题跋中的“我与二公，皆同朝旧，人亡书存”等句，知应麟这段跋文是在归老时，文天祥、谢昌元逝后，应谢氏子孙所求而书写。

应麟此跋，文词端谨，书法工整。与天祥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发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的拙文忽略了王应麟题跋手迹的发表，使我联想到书画、碑帖、古籍题跋的重要意义。记得50年前，启功先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开设《书画题跋》课程，他认为书画的自跋或他跋，不仅见到题跋人的手迹，而且有助于研究被题跋的作品的内容，收藏家每以题跋之有无衡量原作之轻重，把题

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

——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的意义

***** □ 陈 炎 □ *****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从远古的新石器时代起,各族先民就已经交叉毗邻而居。经过千万年的血统交融,文化互传,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血肉相联、亲如手足的中华民族,同时也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居住在东部滨海地区的先民经过长期海上活动而创造的带有海洋特征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海洋文化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有两大文化系统:一是北方滨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二是南方滨海地区的百越文化。越族先民创造的河姆渡文化是百越文化中的母系,它的传播范围很广,不仅与其他系统的新石器文化一起,起着互相传播和交

~~~~~  
跋的内容、形式、章法、布局等,与原作视为一个整体。良以跋文可以辨别真赝,考镜源流,以至比勘各家之说,增进鉴赏学识,而书法之优劣尚属次要地位。如果题跋者是名人、学者,其题跋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历史文物。

因此,对今天的文物工作者来说,《书画题跋》应列为一门必修的专业课程,不容有所忽视。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

融的主导作用,推动和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还向海外传播,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世界、造福人类,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限于篇幅,本文论述的范围,仅为河姆渡文化考察所见及其向外传播和影响。

### 一、河姆渡考察所见及几点体会

1989年,我在宁波大学讲学时,有机会亲到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察。①在考察中,有些新的发现给了我许多新的启迪。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一)在遗址中出土完整的和能复原的陶器近千件,陶片约50万件,其中有各类釜、罐、钵、盆、盘、碗……等属于饮食文化的生活用具,以印纹夹炭黑陶为主,其年代经 $C^{14}$ 测定一般在距今7000年左右。陶器如釜(炊具)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标志,它说明人类已从生食到熟食,从游猎到定居,从野蛮到文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此外,还出土许多陶制生产工具,特别是扁圆形、梯形的各种陶制纺轮,是纺绽的鼻祖,把它与同时出土的打纬骨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经轴(残片)等纺织工具以及和盅形黑陶上刻着四条栩栩如生,向前蠕动的蚕纹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当时该地的先民已有养蚕知识,并有原始的纺织劳动。因此,在距河姆渡不远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属越文化系统的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距今约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②它是我国乃至全世界迄今出土最早的丝织品。这一发现推翻了过去人们一直以为黄河中下游是我国丝绸发源地的片面看法。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下游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养蚕织绸等纺织劳动,比黄河中下游更早。以上的发现不仅对研究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衣食文化(丝绸、陶器)的起源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也以后研究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在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稻谷遗存,堆积层有的

达1米有余(包括稻粒、稻秆和稻叶),数量之多、堆积之厚、保存之完整,是我国任何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从未见过的。经水稻专家鉴定,为我国乃至全亚洲最早的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同时发现的还有动物肋骨制的镰刀和谷物加工的木杵(用以在白里捣谷用)等各种农用生产工具,说明原始的水稻种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过去西方学者如华特(Watt)、瓦维洛夫(Wavilov)和日本的加藤茂苞等都认为水稻种植起源于印度奥里萨邦,后来才传入中国。其实,考古发现证明印度最早发现的稻谷,在中部的卢塔尔,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而河姆渡的稻谷遗存经C14测定为公元前4970年,距今约7000年。这一发现惊动了全世界,中外学者已确认河姆渡是世界上有大量物证的最早水稻产地。我国考古和农业专家还进一步论证了河姆渡文化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并以它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向东北越海传到朝鲜和日本;向南越海传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今泰国、越南、缅甸都称稻为“谷”,与南方越族先民称稻为“谷”一致。③过去学者们认为越南的“占城稻”对中国的水稻种植曾产生过影响。其实,它的老祖宗却在河姆渡,最初由中国传入越南,经过改良后,又反馈到中国的。

稻谷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之一。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种植稻谷的国家有33个,种植面积达1亿公顷,尤其是亚洲有90%的人口依靠它为主要粮源。因而关于它的起源和传播不仅为研究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而且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出土建筑遗迹和几千件木料,构成一种桩柱相结合的“干栏式”长屋。其营造方法:先打一排排木桩,在木桩上设长达20—30米的地梁,最粗的直径有50多厘米,桩柱埋入地下1米多,地梁上铺地板,再在其上立柱、架梁(敷椽、屋顶)覆盖茅茨。底架下面用来圈养家畜,上面住人。建筑构架交接方法

有两种：一是用丫形木材作桩柱，其上架梁；二是交接点用榫卯结构。这种榫卯的发明和应用，是河姆渡先民对木结构建筑节点构造上的一个飞跃。有了榫卯，后世的穿斗式屋架才能形成；有穿斗式构架才有可能造中国式的楼房。它为中国古典建筑木结构技术的发展，乃至世界建筑史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干栏式”建筑的设计与越族先民滨海而居，气候潮湿，雨水多有关，它以防潮隔水为主，与北方的穴居不同。越族先民最早模仿飞鸟在树上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差异。黄河流域早期出土人类住房是以地穴为居址，半坡遗址就有地穴遗存。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居、北人穴居”的南北之别。这种最具海洋文化建筑特色的干栏式结构流传甚广，沿用甚久，至今仍可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如傣族的竹楼和毗邻的东南亚各地的农村见其痕迹。今天，我们所见的中国古代的宫殿和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榭、廊等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建筑艺术，但其基本形式仍以“干栏式”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它对研究人类居住形式的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遗址中还发现六支木桨。柄和桨叶是一块木料制成。经 $C^{14}$ 测定约距今7000年。一般推断，既有桨必有舟，而且舟应出现在桨之前，但河姆渡只发现桨，未发现舟，舟的形状如何，不得而知。但出土了一只“夹炭黑陶舟”，这只“模拟陶舟”，其状半月形，两头尖，呈梭状，基本保持后世出土的独木舟形状，无疑它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所造独木舟形状的写照。再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有段石铳，经专家鉴定，它是新石器时代“剡木为舟”的先进生产工具，专用于制造独木舟。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特征，并向四周扩散，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发现。专家们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后面还将详加论

述)。再从遗址中出土大量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来看，不但用有段石铤制造舟楫已经普及到各地，而且还能利用舟楫到深海捕大鱼。它比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河姆渡文化是越人先民创造的。据古书记载，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八）。以上考古发现，印证了我国古书记载的正确，同时也证明早在 7000 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向征服海洋迈出了第一步；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了条件，也为世界航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一事实，也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外国学者胡说什么中国原始文化“外来说”（安德生：《中国原始文化》）和中国人“不习于航海”（莫克尔吉：《印度航海史》）的种种谬论。

（五）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骨，据生物学家鉴定共 47 种，其中有：现已在浙江绝迹的大象、犀牛、四不象、猕猴等亚热带动物遗骸，证明当时该地尚属亚热带气候。这一发现也纠正了外国学者所谓中国在全新世（地质年代最后一纪第四纪的晚期，全部生物的面貌与现在基本一致）以来，大象、犀牛等已经绝迹的错误结论。此外，在动物遗骸中，以猪、狗、水牛等数量最多。猪有 75 个个体，从其牙齿的形状和前后腿的长短比例，证明是人工养肥后宰杀供食肉的。还有狗的遗骸 12 具，从其牙齿形状和颌骨来看，已接近现代家狗。再从出土陶捏玩具中有“小狗守门”来看，说明该地先民已把狗驯养成为守门、狩猎的助手，还可能已知驯养水牛以代替人力劳动。特别是猪的饲养，证明当地先民早已从狩猎野兽，进化到饲养繁殖，以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

## 二、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

河姆渡文化还限于反映在上述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而且还从物质升华到精神文明的境界。从河姆渡出土的许多在陶

器、骨器、木器上刻划的各种花纹、动植物图案和陶捏的原始艺术品来看，其中以刻划和雕刻艺术最为突出，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与北方黄河流域同期文化有很大差别。河姆渡的所有刻划花纹都是经过设计安排的，和那种无意识的纯粹对自然的模仿有本质的区别。物象造型只是对自然物体感性认识的模仿和抽象，而构图是注入理性精神，通过各种物象造型的组合，以表达人的意志、感情和理想。因此构图的出现，是原始艺术的一大进步，而河姆渡艺术已经达到了构图的程度，就其构图意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反映河姆渡人祈望和吉兆的艺术品。这表现在器物上刻划赖以生存的物质。如祈求禾苗茁壮生长的“禾纹”、祈求水稻丰收的“稻谷纹”、祈求渔业丰收的“鱼纹”、祈求家畜兴旺的“猪纹”等等，从而出现了各种构图如“鱼禾纹陶盆”、“稻穗纹陶盆”、“陶猪”等器物刻图案。它既美观，又表示了人们对稻谷、鱼、猪等赖以生活的物质的追求和生产的祈望。以鱼禾陶盆为例，只从单纯的鱼或禾苗来看，无疑是对自然物的简单模仿，如果从构图的意境出发，则另当别论了。④水稻和鱼既都具有海洋文化的生态属性，又都是当时河姆渡人民所追求的两项维持生存最主要的物质。以鱼而言，遗存中鱼骨遗骸数量之多、用途之广，足以说明河姆渡先民对鱼和水稻怀有特殊的感情，把两者巧妙地刻划在同一陶盆上，既是一种祈望，又是一种吉兆的表示。这一艺术成就要比汉代人的文字记载，吴越地区人民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见《汉书·地理志》），提前了几千年。这一艺术品反映了早在六七千年前，这种生活实际上已经在河姆渡存在。这一习俗至今未变，故江南仍有“鱼米之乡”之称。

（二）反映对大自然赞美的作品也十分明显。如在一块刻花的陶片上反映了对大自然景观的描绘。从残块花纹来看，刻纹中的卷曲线条很像藤蔓，狭长状的树叶代表了蕨类，短而粗的树叶则是

雨林中的常绿阔叶树，阔叶中间夹着圆圈纹，代表果实。以上三种类型的植物都存在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山区。因此，这是一幅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雨林的景观。反映了河姆渡人对他们周围生活环境的热爱和赞美，也是对四明山区美丽原始森林的歌颂。他们把在山上看到的自然现象，经过抽象图案化组合在一起，形成刻花陶块，用以做装饰的艺术品。⑤它具有既写实又夸张，既写景又寄情，既源于生活又超脱生活，富于浪漫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等特点。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古老的一幅以写意为特征的森林风光画。

(三)反映图腾意识的作品也到处可见。这类作品不是刻划在陶质生活器皿上，而是雕刻在不易破损的象牙和骨制器物上。河姆渡人崇拜鸟与他们崇拜图腾有关，如在象牙上刻划“双鸟朝阳”表示只有飞鸟才能到达天上飞向太阳。还有在骨匕柄上刻有“连体双鸟”和“双燕比翼齐飞”等等，据学者们研究，连体双鸟纹可能是河姆渡人“图腾崇拜的某种标记”。⑥

河姆渡的越人以鸟作为图腾崇拜，不但见于上述原始艺术品，还可从春秋战国时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得到印证。如1973年8月在江苏六合县古墓中出土了一个吴越风格的铜匱，上刻“鸟田图”，两个农夫在田头躬身插秧，伫立着四只昂首长啄的鸟，鸟前有六人手持禾苗做跪拜状，似乎在祈求神鸟，保佑吉祥、丰收之意，反映了稻作文化的心态。越人崇拜鸟不仅见于原始艺术品和上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而且还见于古书记载：“(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类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见《水经注·浙江水》)《吴越春秋》也说：“百鸟佃于泽。”从以上记载，不难理解越人为什么要崇拜鸟，因为鸟对稻作农业的丰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把鸟奉为吉祥的象征。所以《吴越备史》说：“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

此外，河姆渡的原始刻划艺术的特征还表现在敛口釜上面刻划的几何纹母题，主要有弦纹、贝齿纹、斜线和谷粒纹四种。据学者们研究：

1. 弦纹可能来源于农耕，代表水稻耕作方式，整齐划一的禾田，远望便是一系列平行直线。
2. 弦纹中的短斜线可能代表刚生长的秧苗。
3. 弦纹代表(稻谷)正在抽穗。
4. 弦纹中间有两行圆圈代表稻谷成熟纹。

以上系列几何图案刻划纹的共同美学特征，是图案简洁明快，具有对称美和装饰美的特点。⑦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姆渡人稻作农业全过程。

河姆渡的原始艺术除上述的刻划艺术外，还有手捏的陶塑，如陶羊昂首而卧、家畜俯首进食、游鱼泳跃等等。陶塑人像中还有耳上戴着石环、胸前佩着石玦、腕上戴着陶环等装饰品。这些艺术品神态逼真，栩栩如生。还有一件反映海洋文化典型的陶船和一件瓜棱形圈足木质漆碗，外表涂着朱红色的颜料，经过化学和光谱分析表明，这种朱红色的颜料为生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成分相似，但其年代比马王堆汉墓还要早几千年。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涂漆制品，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都生动地反映了原始社会中当地人民的真实生活。同时它也说明，随着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河姆渡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审美要求和有余力来从事艺术创作。上述原始艺术作品，无论从美学特性、艺术构思、还是从心态意境来看，在 7000 年前就已达到这样完美丰富的程度，这样高的艺术造诣，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闪耀出东方文明的曙光。

### 三、河姆渡文化的向外传播及其影响与贡献

(一)向近海的舟山群岛传播:从河姆渡遗存中的大量鲸鱼、鲨鱼的遗骸来看,河姆渡的先民早在 7000 年前,已能利用舟楫进行原始航海活动,到深海“东狩于海,获大鱼”了。造船的先进生产工具——有段石铳,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量出现,意味着舟楫的制造已经兴起;而舟楫的制造和应用,又促进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并将其文化先向近海的舟山群岛传播。

1976 年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市白泉镇十字路、唐家墩,嵊山岛东部的北仑门以及岱山县的大衢岛等新石器遗址,均出土大量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的印纹陶和有段石铳等物。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论早晚,都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几乎完全相同,其年代距今 5500 左右。<sup>⑧</sup>这一发现说明河姆渡的先民在 5000 多年前,就已使用原始的舟楫成功地登上了舟山群岛。这不但被上述出土遗物所证明,而且也由特殊的地理条例所决定。我们知道舟山群岛犹如撒在东海沿岸的一串明珠。它共有大小岛屿 600 多个,散布在不足 100 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它们距河姆渡不远,各岛之间的距离最多也只有十几哩,从河姆渡到舟山本岛,其间还有许多中间小岛可作中间站。因此,河姆渡先民完全能利用地形地物导航,只要凭借一叶小舟,就可来往于大陆与群岛之间。他们就是利用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从沿海大陆向海洋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活动的起源。

如上所述,我国原始造船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有段石铳的功效,而有段石铳先向近海舟山群岛等岛屿传播,更有赖于原始造船技术的发展,正是随着这种有效的生产工具和造船技术的传播和发展,才有以后再从近海岛屿向台湾海峡乃至向更遥远的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播,乃至后来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华文化同太平洋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

(二)横渡台湾海峡向台湾传播:过去论台湾与祖国的关系,都

以《三国志》中，东吴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作为最早的文献记载。⑨其实，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和台湾人类的起源。据我国华南区第四纪的地质资料所记，在第三、四纪之间，台湾和琉球群岛都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台湾西部才有了狭长的海湾与南海相通，但其西北部仍与大陆相连。大陆的古人类和古生物都可通过陆桥迁徙到台湾。1970年夏，在台南左镇乡发现“左镇人”的顶骨化石，经氟、锰含量测定，为10000—30000年前的人类骨骼。经专家鉴定，它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属于“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时代相同；是从祖国大陆迁徙到台湾的。这是迄今在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968年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现距今15000年的“长滨文化”旧石器遗址中的石器，与我国大陆南部出土的旧石器对照，不论从制作技术上，还是从基本类型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⑩而“长滨文化”的主人就是从大陆穿越台湾海峡到达那里的。⑪

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铤，台湾也有大量发现，尤以台北圆山贝冢内最多。据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有段石铤是从大陆沿海浙、闽、粤地区传播过去的。⑫近年来还在台北盆地发现芝山岩文化，有些重要的因素在台湾找不到祖型，而与浙江的关系却非常密切。例如有一种形状特殊的陀螺形木质器物，为别处所未见，只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在芝山岩遗址下层，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炭化稻谷，石斧、石铤等工具，证明当地的先民已能栽培水稻。学者们认为迄今亚洲年代最早的稻谷标本既在河姆渡，那么，芝山岩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约3000—4000年。因此，台湾最早的稻谷栽培技术无疑是从浙江河姆渡一带通过近海岛屿传过去的。（13）

从地理和水文条件看，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有一条宽约100余海里的台湾海峡，其间虽有澎湖列岛，与闽、粤之间的海上距离只有80海里，但台湾海峡是我国频率最高的大风区，终年风大浪

高,在海峡中还有常年南北向的海流,时速在1—2海里之间。以上这些不利条件,对横渡台湾海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可以想像只凭还没有抗拒风浪能力的独木小舟,要横渡这条海峡是有不少困难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却视汪洋大海为坦途,勇往直前、与狂风恶浪搏斗,终于征服了海洋,成功地横渡台湾海峡。他们登上了台湾岛,把他们的文化也传播到台湾,然后再从台湾传播到更辽远的太平洋地区。台湾于是成为我国东部沿海的古代文化与大洋洲的古代文化之间的一座天然桥梁,而架设这座桥梁的越族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向海洋进军的壮举,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那种不怕牺牲、积极进取、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像这样重要的历史却不见于中国历史的记载,我们见到的,却是在几千年以后所发生的三国时卫温渡海到夷洲(今台湾)。可见中国的历史有些地方确实需要重写。

(三)向菲律宾传播:有段石铤既如上所述,是新石器时代用以造船的先进生产工具,对造船航海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它除传播到近海的舟山群岛和台湾以外,还传播到更远的菲律宾群岛。菲律宾考古学家拜耶(H. A. Beyer)在菲律宾各地发掘到近万件的石器,其中有40—50%为有段石铤。1928年他与荷兰考古学家卡伦费尔(S. Callenfil)一致认为它是菲律宾的新石器器物,因而定名为“菲律宾石铤”(Philippin Adze)或称“吕宋石铤”(Luzon Adze)。次年,英国人类学家迪克逊(R. B. Dixon)在马尼拉鉴定拜耶所掘的与玻利尼西亚的相同。因此,拜耶认为太平洋各岛发现的有段石铤,都是从菲律宾向东传过去的。而菲律宾的史前文化基本上是由不同时期的七次移民运动构成的。其中第四次移民始于新石器时代之初,是经由海路来自北方(指中国台湾)的民族传到菲律宾的。直到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台湾,特别是河姆渡出土大量有段石铤后,中外学者才一致承认它是从中国先传播到近海岛

屿、台湾,然后再向菲律宾和太平洋各岛传播。我国考古学家林惠祥教授根据器形的特点,还把同物异称的各种定名统一起来,定名为有段石铳。他还推测:有段石铳从闽、粤(当时还未发现河姆渡遗存)传到台湾,约在 3000 年前。然后由台湾或由广东经东沙群岛等处传到菲律宾,由菲律宾再传到苏拉威西和北婆罗洲。玻利尼西亚诸岛也应该是从菲律宾传去,其年代更迟,约在 1000 余年前才由菲律宾传到玻利尼西亚。因为菲律宾的新石器时代迟到 1000 余年前才完全结束,而太平洋诸岛远隔重洋需要有较进步的造船航海技术才能到达。<sup>⑭</sup>由此可见,菲律宾在传播以河姆渡文化为特征的有段石铳中,居于台湾与西太平洋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笔者于 1991 年 2 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有机会亲自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考察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更具体、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和造福人类的伟大意义。这次沿途考察,从各国出土和打捞的中国古代沉船和考古发现表明,早在 7000 年前,河姆渡一带的先民就用原始舟筏开始海上航行。我在马尼拉博物馆见到陈列的史前石器和陶器,其中有印纹陶,特别是有段石铳和原始稻谷种子标本,都和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基本一致。这就不但印证了过去中外考古学家的上述考证是正确的,而且还充分证明中菲两国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期。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中菲两国文化联系要比以往的中外史书记载和史学家所说,始自公元 982 年,<sup>⑮</sup>要提前几千年。中菲之间的海上交通在原始的航海时期早有交往,在近现代就更加频繁。这在菲律宾博物馆所陈列的历代航行于中菲之间的各种帆船(Junk)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福建造型的帆船。它们和中国古书《东西洋考》中卷五“吕宋”和卷九“舟师考”所记相同。其航线也与该书“东洋针路”中

所记一致，可以互相印证。展览中还陈列出土的中国历代古瓷和珍藏的各种中国丝织品，反映了中国丝绸、瓷器贸易，促进了由马尼拉中转到美洲墨西哥，这条连接中、菲、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以菲律宾在促进中美之间丝绸、瓷器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为主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如果说台湾在我国原始航海活动中，是联系祖国大陆和菲律宾等岛屿的自然桥梁，那么到了近现代，在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中，菲律宾则是联系中、菲、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桥梁。它在传播中华文明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既有大陆文化又有海洋文化为主体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有些外国学者胡说什么中国文化来自埃及、西亚、中亚和西伯利亚等等的一切“外来说”，和中国人不习于航海等等谬论。同时也修正了过去传统地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源中心说，中华文化起源的多中心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所证实。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不仅使这种论据更加充分，而且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华文化具有多源区域性发展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以及中华文明的渊源具有多重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因此，研究长江下游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既有中原向四周扩散的大陆文化，更有自东南沿海向海外传播的海洋文化。它给人类进化史和世界文明史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也是东方文明的瑰宝，放射出夺目的曙光，为谱写中华民族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